

资本逻辑批判视域下的智能化生产方式探究

都超飞, 袁健红

摘 要: 智能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智能化, 形成了智能化的生产方式, 引发了生产方式新变化。从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考察, 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产物: 从技术范式来说, 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形成了智能化的生产力, 使生产具有了类人的智能性; 从社会范式来说, 人工智能作为固定资本的最新物质表现形态, 是资本关系调整的必然结果, 导致资本统治劳动关系呈现出智能化、隐匿化特征。其所形成的“新资本形态”在智能革命背景下又带来了新的智能危机: 其一, 财富创造的平民化与财富增长的资本化之间的矛盾; 其二, 自由时间的增加与资本剥削的极化之间的矛盾; 其三, 技术的解放潜力与人类生活无意义之间的矛盾; 其四, 智能民主交往与智能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 要将智能革命与智能异化的资本主义根源区别开来, 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动智能革命的良性发展, 解放和发展智能生产力, 调整生产关系, 为人类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关键词: 智能革命; 资本逻辑批判; 智能生产方式; 智能危机;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F0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0)05-0001-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0.05.001

智能革命既有促进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 推动社会进步的“天使”一面, 但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又可能带来智能危机, 出现智能异化, 导致资本通过智能技术对劳动和人的生命活动进行智能剥削的“魔鬼”一面。面对此问题, 本文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由智能革命带来的智能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引发的相关问题, 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面对不同以往的智能革命, 生产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智能革命所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什么? 在资本逻辑统治下形成的新资本形态又会出现哪些危机和矛盾? 相较于资本逻辑导致的智能危机, 社会主义是否有能力与智能革命深度耦合、钳制资本逻辑, 有效回应智能革命?

一、智能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新变化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3D 打印、生物基因和可再生能源等在内的智能技术突飞猛进, 推动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智能技术革命。各国政府相继出台多种促进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发展的规划纲要, 积极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布局。国内外学者也都纷纷著书立说, 认为人工智能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将对人类的生产劳动、生活消费、思维观念和社会转型产生颠覆性影响^[1](P6-11)]。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创新的存在论路向”(KYCX17_0214)

作者简介: 都超飞,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duchaofeisuper@126.com (江苏 南京 211189); 袁健红, 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生产劳动领域,智能革命推动形成了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一是智能化生产和决策成为物质生产的主要方式,产生了诸如智能工厂等物质生产组织形式。2018年至2020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先后评选出44家在制造业领域能够引领全球工业创新的“全球灯塔工厂”。这些“灯塔工厂”的典型特征就是采用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产线的智能化转型,通过“生产价值驱动因素的全方位改进催生新的经济价值”,“以最小的员工取代数实现了效率的空前提升”^{[2](P5)}。二是非物质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主要指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的劳动:生产智力、语言等方面的劳动和情感劳动^{[3](P108)}。三是智能产业成为当下和未来起决定性的产业,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产业: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领域的产业、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服务产业。

在生产关系领域,出现了劳资关系的隐匿化现象。一是生产资料由占有到共享。就物质生产资料来说,人们的所有制观念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生活资料领域,由原来对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转向共享,出现了如滴滴打车等共享经济;就非物质生产资料来说——数据、信息、知识等,其本身所具有的外溢性只有被更多的人分享方能实现其价值。二是劳资关系的对立和矛盾由有形到无形,即以弹性劳动为标志的劳动关系表现出极大灵活性。劳动场所的去人化导致资本对劳动的直接控制削弱化现象;弹性工作时间解除了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时间;以数据、信息和知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对象呈现出流动性特征。三是资本增殖的最终受益主体复杂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导致受益主体模糊;全民股东导致每个人都成为资本获利者;跨国公司和平台公司的利润分配日益复杂化。四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因素同时增加。智能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使市场供求关系更加透明,企业利用网络交易数据进行供需关系分析,实现有计划的精准生产和销售。也就是说智能技术的发展,既能保存市场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作用、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又实现了计划经济中计划的作用。五是劳动力技能需求极化。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发展对高技能、高学历和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同时降低了对助理性质的劳动者的需求。

在消费领域,数字消费成为主要的消费领域。一方面,数字网络成为我们现实消费的中介。我们不再按照传统的直接性消费方式进行消费,而是将网络上某一产品的评述和介绍作为我们消费的参考,并在消费结束后将个人感受反馈至网络平台,形成一个消费闭环。另一方面,数字消费同时具有了社会交往性质。网上交流成为当下社会交往的时髦和主要方式。网络上的各种新闻、书籍、购物等都成为我们主要的消费内容,并根据兴趣爱好结成网络社交群体。在此基础上,智能算法根据每个人的数字消费习惯和路径不断推送和调整营销战略,替代我们做出决策。

针对以上变化,西方学者提出的诸如“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后福特主义”“消费社会”等概念和理论大多是从生产过程之外来研究生产过程的,是站在静态的经验性描述视角以资本的权力布局为前提去分析种种情况的资本权力建构问题,因而往往不能从生产过程的范式和社会范式两个角度展开本质性分析,更无法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及其在具体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逻辑层面阐述这一变化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导致其解决方案大多表现出理想主义色彩,没有把握到由智能革命带来的现实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性那一度。

而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从劳动过程的技术范式和社会范式两个角度来分析智能革命带来的种种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逻辑,探讨这种变化及由之而来的那个社会内在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在智能革命时代的具体形式,更能准确把握此次智能革命的社会关系维度,并在这一过程中看到社会主义在面对智能技术异化问题时超越资本主义的一面。

二、智能化生产方式的本质批判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洞见进行了表述:“人们在自

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4](P2-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讲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P403)}马克思在此指出了资本主义生存的一般规律,即通过对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变革,进而变革生产关系,进而变革社会关系^①。而对生产工具的变革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在社会需求的前提下,首先是机器组成部分中工具机的变革,然后是动力机和联动机的变革,最后才能形成生产工具的变革,而这一切都要求科学技术参与其中并运用于生产过程。因此,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一般规律就表现为:一定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社会需求—科学技术创新—工具机变革—动力机和联动机变革—生产工具变革—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社会关系革命。这里的关键是,某一科技创新能否在物质形态方面成为新型的生产工具。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对智能革命所引发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的批判,揭示其本质及其存在的新的矛盾和危机,并基于这种现实矛盾的分析判断其未来发展的走向,进而从当代人类面对的共同情况和资本主义的弊端出发,探索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具体路径^[6]。智能化生产方式的本质是处于资本关系下的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被应用于生产生活领域中所形成的智能生产力及建基于此的生产关系。

首先,从生产过程的技术范式来说,人工智能作为当代高新技术的代表,被资本纳入生产过程,使生产过程具备了智能性。“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7](P94)}假如说人工智能之前的机器体系主要是作为活劳动的人的体力本质力量之对象化的产物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就是作为活劳动的人之智力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并被运用于机器体系之中,形成智能机器体系。“它们是人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7](P102)}与之前一切机器体系不同,智能机器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我意识”^[8],可以在没有工人协助的情况下进行全流程的自动生产,并对生产中的问题进行预测和自我检修。因此,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成为智能化的社会生产力,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符合了固定资本替代人力资本的要求。人工智能在图灵的设想中是实现“如同人一样思考和行动”的机器,这也就暗含了人工智能对人的智力替代的逻辑,因此,它必然会成为资本的科技猎物。而随着信息技术产生的大量数据^②需要被处理,进一步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的社会需求,加之GPU定制芯片的研发、云计算的出现和量子计算的发明解决了人工智能算力问题,而深度学习、类脑智能都为人工智能解决了算法的问题。此时,资本主义国家宣布这一新型科技的到来只差一个机会,而2016年围棋人机大战以独特的方式成为这一战略的引爆点。

由智能革命推动形成的生产方式的新形态可以称之为数字智能机器生产方式,“数字”一词不仅表明了当代信息高科技的社会本体,还提示了作为当代社会交往关系维度的网络社会特征;“智能”一词主要区分了与传统自动机器体系将人的体能对象化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的将人的智能对象化在生产过程中所体现的智能化特征;“智能机器”是一个内涵较为宽泛的用语,不仅包括了物质实体形态的机器的智能化特征,还包括了内含于智能机器体系中的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软件系统。数字智能机器生产方式对应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为“数字智能资本主义”,主要是借

① 这里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先有生产力的变革,后才有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共同统摄于物质生产方式。

② 数据总量的增长规律符合摩尔定律。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测算,人类产生的数据总量将呈指数增长,大约每两年就会翻一番。

用了马克思当年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中所包含的生产方式的技术范式和社会范式两方面的批判路径和方法^①。当然,有的学者,如钟义信将“人工智能+互联网”生产方式称之为智能化互联网生产方式,认为其是当代最优越的社会生产方式^[9],而刘方喜则认为“物联网+人工智能”才是终极生产方式^[10]。两人的界定都侧重于技术范式的物质实体方面,而缺少了数字社会本体维度。农华西沿用了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的说法,提出“智能机器大工业”概念^[11]。这个概念就技术范式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在社会范式层面则落后于当代社会交往关系发展实践,因为现在的社会交往关系已经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大工业了,而是网络社会。在这方面,由丹·席勒提出的“数字资本主义”概念可以概括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下阶段的主要特征,提示着当代信息高科技的社会本体。蓝江进一步将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概括为一般数据、虚体和数字资本^[12]。但是,这一概念无法涵盖当今主流技术的全部特征,特别是智能化的生产力,也无法反映资本生产和流动的智能化特征。

其次,从生产过程的社会范式来说,人工智能和智能化的社会生产力的出现是资本关系自我调整的产物,并在再生产中不断巩固新型资本关系。智能革命不仅更新了固定资本技术结构中的智能因素占比,使人工智能成为固定资本的最新形态,还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排斥了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并通过智能技术调整资本剥削的方式,形成并巩固了新的资本剥削关系。

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固定资本在当下的最新物质呈现形态。马克思讲到:“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7](P93)}作为固定资本之最新物质形态的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由资本发展的总过程决定的在21世纪的具体的资本存在方式。它是资本关系发展的产物,只不过它表现在一个物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固定资本的增加代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人工智能所代替的不仅是体力,还有人的部分智力。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人工智能的使用在结果上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在过程中表现为固定资本投入的提高、人力资本使用的相对降低。智能生产、无人工厂正是符合了资本的这一趋势。这表明人工智能的使用提高了资本相对剩余价值获取的能力和空间。但是,人工智能的使用并不是单纯科学技术积累和创新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它有深刻的社会关系根源。2008年,美国的债务危机迅速引发了金融危机,进而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使得资本增殖空间严重受阻,依靠剥削活劳动的资本策略崩溃。因此,如何在尽量减少直接劳动力使用的情况下提高资本积累成为资本新型权力能否形成的关键问题。人工智能符合了资本的这一需求,成为固定资本替代人力资本的不二法门。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策略既符合了资本对高智力劳动的需求,又符合资本重新吸纳高技能劳动力的权力布局。智能化资本的权力范式是精神物化,其权力的布施通过建立无人工厂(其实是将工厂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社会)使得智能社会工厂化;通过弹性劳动来实施智能化资本的柔性纪律规训;通过使工人再智能化和智能极化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通过营造虚假消费需求,使民众在由大众媒介制造的仿真景观社会之中进行符号消费。正如居伊·德波所言,“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13](P3)}。

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智能化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数据、知识和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观念。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可重复性和价值外溢性等特征,它们由众多人类主体共同创造出来,却被平台公司无偿占有,很难从法权层面确认其归属权,因而,数据时代的新型生产资料不仅改变了私有制观念,还会朝着透明和共享方向发展。因为分享的越多,新型生产资料使用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才能越大。而当这些数据通过人工智能、云计

① “数字智能机器生产方式”和“数字智能资本主义”概念是资本主义在智能革命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新生产方式和新资本形态,其具体内涵及其深层机理,笔者将另著文章详细阐述,在此只是提出,不做详细展开。

算等智能技术的整合、挖掘,形成对交易信息的全面分析报告,并将其推送给销售方后,可以使生产商和投资商明了市场需求信息,调整生产和投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市场经济的盲目性,缓解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同时,智能生产力在生产效率方面的极大提升,资本、生产和劳动对象的流动性,导致劳动弹性化,这意味着工作场所的去中心化、劳动时间的灵活化、劳动内容的流动性。在此基础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由传统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转向数字智能资本在全时生活中对数字生命的全面剥削。从其表现形式上看,这种新型剥削方式呈现出隐匿化特征。但是这并不代表剥削关系的弱化,它表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具体表现在:剥削时间从工作时间扩展到任意时间,把自由时间变成剩余劳动时间,甚至人类的睡眠时间都能够成为以健康名义出现的资本的剥削对象;剥削内容从活劳动的使用价值到所有人的生命政治,通过 APP 和各种智能监控设备对个人的所有信息进行细节性挖掘,进行精准化无感剥削;剥削手段从直接的规范式暴力到个性化协作,营造出以多样化的个人主体性行为和思想为形式的劳资平等幻象。例如股份制和跨国公司等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使得工人和广大股民纷纷成为公司的个体股东,其实不过是资本新的实现形式和组织形式,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扩大资本控制范围、提高资本增殖效率罢了。此外,高知识阶层的崛起表明智能革命时代的财富分配倾向于资本和高科技研究者,而普通知识阶层则被分化为高知识阶层和低技能阶层。

以上两点表明了这样一个历史现实,即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产生不仅有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积累和创新的功劳,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被资本当做固定资本纳入增殖逻辑中充当相对剩余价值剥削的有力武器,它必然同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相应的变化。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的调整,只是在形式上模糊了资本剥削的界限、手段和内容,并没有消除资本剥削的实质,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剥削。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展到智能生产方式阶段时进一步激化了。

三、资本关系下的智能异化和危机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的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资本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社会关系,又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智能技术这种新的生产资料、智能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发生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产生了智能危机^{[5](P340,341)}。假如说资本主义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危机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在信息资本主义时期的危机表现为金融危机,那么当今数字智能资本主义的危机就表现为智能危机,即资本主义的劳动范式发展到数字智能劳动这种形式时,由智能化生产力创造的高度丰富的社会生产力与数字智能资本对财富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各方面的危机和矛盾。具体表现为以下矛盾:

第一,智能技术的资本占有导致财富创造的平民化与财富增长的资本化之间的矛盾。在数据和知识成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今天,数据的生产和知识的创造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无论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APP 所产生的数据、电子商务平台商的交易行为产生的贸易数据,还是各种智能设备对周围环境变化的采集数据,都被各大平台公司免费收集过来,通过智能算法和数字化技术进行深度挖掘,成为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非常有价值的数字智能资本,不断榨取巨额剩余价值。这种数字智能资本被大公司无偿占有,其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些大公司付出的技术代价,但生产这些数据的民众并没有获得报酬。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民众获得多少报酬合适,而在于这些数据是应该被大公司合法地占有还是进行数据共享?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数字智能资本对民众生活权力

的霸权行径。大公司不仅无偿占有这种数据,并且将这种数据有偿出卖给市场需求方。更有甚者,有的公司利用用户对其平台的依赖性和信任度,通过智能算法将用户需求的某些产品进行差异化营销,导致用户无权享受到某项服务或必须高价才能享受服务。

第二,智能劳动剥削隐匿化导致自由时间的增加与资本剥削的极化之间的矛盾。智能生产力可以在很少人参与劳动的情况下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极大丰富的世界,减少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降低其劳动强度,增加自由时间,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这些自由时间的增加并未成为人类解放的社会条件,反而成为数字智能资本进行剥削的另一片领域。“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7](P103-104)}与资本主义传统剥削手段不同,数字智能资本通过智能技术不仅扩展了剥削的广度,还厚植了剥削的深度,并在这两方面将剥削程度提高到极限状态。这表现在:资本从对人们体智力的剥削扩展至全生命周期的剥削;从对处于劳动领域的劳动者的剥削发展至对所有人的剥削;从在劳动时间内的剥削发展至全部时间的剥削;从在全球范围内的剥削扩展至对太空的剥削,等等。

第三,日常生活的智能殖民导致技术的解放潜力与人类生活无意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讲到,资本主义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发达得多的生产力,但它同时加深了人类异化。进入智能革命时代,人类第一次看到了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不再为人类生存担忧的曙光,但是在资本关系条件下产生的高度发达的智能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异化——数字异化^[14]。人工智能体的出现对人类的主体地位造成了威胁,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引发了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甚至消灭人类的担忧,导致作为人之生成中介的劳动的无意义。智能手机和各种APP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在消减人类物理距离的同时也增加了人类的心灵距离,人类实现了即时交往,但同时感到无限的孤寂,并日益通过赛博空间同另外的人发生实质关联,人类的社会性逐渐丧失。生活的富足充裕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方式,同时伴随着人类精神生活方式的堕落,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消费升级使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一个个娱乐场,我们总是漂浮在空中,越来越远离大地,人类的精神性逐渐消失。

第四,智能技术垄断的智能帝国主义导致智能民主交往与智能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智能革命造成的新全球化智能民主交往趋势体现在:(1)一个智能系统只有依靠大数据喂养和自主学习,才能不断迭代,其智能水平才能不断攀升。这必然要求人工智能以全球信息资源和智力储备为根据。(2)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基于全球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的计算决策系统为全球企业和政府的生产和资源配置提供了根本依据,企业可以实现精准生产和营销、消费者可以实现精准消费。如此,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在智能调配系统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资源的高质量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最大化效能。(3)虚拟现实的发明使得人类的全球交往进入了新的全球化时代,可以在不发生物理移动的前提下实现深度交往^[15]。然而,受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纷纷实行再工业化的逆全球化政策,并通过智能垄断形成智能帝国主义,着重在人工智能、5G等高端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措施,不仅禁止本国高新科技外流,还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他国高新科技的正常发展。

智能革命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社会治理和思想观念造成了巨大影响,在促进人类物质财富发展的同时却产生了新的智能异化。但是我们要区分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社会应用方式,人工智能将人类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却使人们的工作时间扩展至生活时间,其带来的失业造成了对人类智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因此,对智能生产力潜能的最大发挥和人类异化状态的消除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完全发挥出来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的今天,从理论上说明和探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路径,将使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四、智能革命的社会主义应用方式及其优势

同一种生产力,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智能革命,被资本的增殖逻辑裹挟,其生产的目的在于利润最大化,其生产的财富及其生产资料本身都被资本占有,因此,造成了诸多异化问题。面对智能革命及其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异化问题,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制度优势不仅能解放和发展智能生产力,还能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智能生产力为人服务,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要矛盾要求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当下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驾驭智能革命中的资本逻辑,使资本的作用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

首先,智能革命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生产方面,智能革命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技术动力,能够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智能革命是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能够赋能产业发展、创造新型业态、更新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利用智能革命初期的优势、传统技术经济范式路径弱依赖优势实现本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在所有制方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智能革命的加持下更加多样。智能革命推动了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有利于消除因物质缺乏带来的所有权纷争,提高生产和消费的即时性、智能性和计划性。智能技术和数据等新型生产资料一方面因其所具有的可复制性、交换成本低、边际报酬递增等特性而天然具有共享性质;另一方面以3D打印等先进制造技术的普及为前提的物联网平台产销一体化推动人们观念上由对物的占有转向对物的共享,并可能塑造出公共性质的公共资源。公共生产资料的塑造、共享经济的出现有利于扬弃以财产私有制为前提的占有和使用关系,形成使用优于占有的物的共享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方式方面,智能革命可以形成新的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提供蓝本。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社会生产过程呈现出智能化和“按需生产”的特征,因而可能克服市场经济体制的无政府状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诟病,“建立一种能兼顾计划和效率、多点互动、实时协同的参与性经济计划”^[16]。在分配方面,智能革命带来的高度发达的智能生产力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

其次,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能够克服资本逻辑下的智能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智能危机,是因为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在资本增殖逻辑的主导下智能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智能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分配制度的社会性和自由全面发展导向,社会主义能够克服资本逻辑统治下的智能危机:第一,公有制保证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属性,智能技术公有制决定了智能技术为民所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智能技术说到底归全体人民所有,因而在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只向利润空间大的领域和地区发展,它还要与人民的生活深度融合,充分照顾到偏远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避免智能生产力的资本应用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和智能鸿沟。此外,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又可以在保持智能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性的同时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造福人民。第二,分配制度保证了智能财富分配的合理性,智能产品的三次分配有利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能够保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高比重,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收入。而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再次分配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第三次分配,可以合理调节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比例,促进社会财富分配原则的公平性,避免智能生产力的资本应用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剥削极化问题。第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保证了智能技术使用的价值旨归。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人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一切要以人类解放和

社会解放为目的,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相比于以物取代人、以资本增殖取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坚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引领智能革命的发展方向,设计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这种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价值导向的体制设计具有“强大的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功能”^[17]和更大的社会包容性与沉淀性,能够实现多领域全面协调发展,在根本上为智能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不仅能够规范智能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更能保持人们心中的价值追求,消除片面异化发展。

最后,社会主义要发挥制度优势,推动智能革命的向好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全社会最优质和最强大的资本力量、物质力量和人才力量投入人工智能领域,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保证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同时将人工智能同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发展智能经济,创建智能社会,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要以更加包容和创新的姿态为智能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一方面,凡是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另一方面,应根据智能革命发展的现实要求不断调整和创新推动其发展的制度体制。当下,社会主义面临的难题是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推进科技成果公有制方面达成平衡^[18]。因此,应积极探索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科研团队和企业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充分保障广大群众的普遍基本利益不受侵害,充分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掌控力和吸引力。要在全力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完善的同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社会条件:实行基本收入制度和全民股权制度,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实行岗位轮换和定期休假制度,拓展人们的能力和素质;实行终身教育培训,提升人们的技能、艺术、科学和哲学水平;创造人们社会交往的优质条件,拓展人们交往的地理范围,丰富人们交往的形式手段,提升人们交往的内容质量,实现人们的智能交往。

五、结 语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革命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形成了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革命性力量。然而,对智能革命的分析不能从单纯科学技术创新和积累的角度进行,人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进行。从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来看,智能革命的发生和兴起符合资本作为“物—关系—过程”的逻辑运演过程:人工智能是固定资本在当代发展的最新物质呈现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不仅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通过智能革命这个中介又形成了新的资本关系,并在这种新的资本关系的再生产中不断实现着自我重塑和自我扩张。因而,智能革命虽然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特征,但是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反而产生了智能危机。面对此问题,我们要将智能革命本身和智能革命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区别开来,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价值观引导智能革命的良性发展,使其在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智能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为人类服务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 [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M].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2] 世界经济论坛,麦肯锡公司.第四次工业革命:制造业技术创新之光(中文版)[EB/OL].<https://wenku.baidu.com/view/ae924e8afbd6195f312b3169a45177232f60e4ab.html>,2019-03-13.
- [3] Hardt,M.,A.Negri.*Multitud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吴元梁.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J].河北学刊,2004(1).
- [7]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8] 都超飞,袁健红.资本关系的重塑及其再生产:人工智能的社会内涵和历史意义[J].江海学刊,2019(6).
- [9] 钟义信.互联网+人工智能:当代最优越的社会生产方式[N].人民邮电,2015-11-23(06).
- [10] 刘方喜.物联网+人工智能:人类生产方式的终极革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9-25(06).
- [11] 农华西.智能革命视域下的共产主义生产力研究[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6).
- [12]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3).
- [13]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14] 蓝江.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J].社会科学,2018(11).
- [15] 鲁品越.智能时代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J].思想理论教育,2017(11).
- [16] 夏莹,牛子牛.当代新资本形态的逻辑运演及其哲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1).
- [17] 本刊记者.中国奇迹“奇”在哪里?——访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教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4).
- [18] 余金成.当代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新趋势[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2).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que of Capital Logic

DU Chao-fei, YUAN Jian-hong

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promotes the intelligence of social productivity, forms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ode, and triggers new changes in the production mode. According to Marx's theory of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e relation, the emergence of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ode is the concrete historical product of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e relation; on the technology paradigm,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has formed intelligent productivity, which makes production have human-like intelligence; on the social paradig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latest material manifestation of fixed capital,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adjustment of capital relations, which leads to the intelligence and concealment of capital-dominated labor relations. "The new forms of capital" has brought a new intelligent cris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revolution: first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 of wealth creation 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wealth growth; second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creasing of free time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third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beration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and the meaninglessness of human life; final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telligent democratic interaction and intelligent hegemonism. Therefore, we should distinguish the capitalist root of intelligent alienation from intelligent revolution, reform the capitalist system,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revolution by taking advantage of socialist system advantages, liberate and develop intelligent productivity, adjust productive relation and lay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human liberation, communism realization and human'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lligent revolution; critique of capital logic;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ode; intelligent crisis; socialism

(责任编辑 孙 洁)